

文物里的太原

石核：史前人类的硬核技术

王芳文/图

悠悠岁月，为太原沉淀了无数珍贵文物，它们是历史的回响、更是文化的传承。去年“文物里的太原”专栏广受读者好评，今年我们再度启程。

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，它们见证历史、传承文脉。在这个专栏里，一件件镌刻城市记忆的文物，将成为开启太原历史大门的钥匙。我们将继续带您沿着时光脉络，品读太原的沧桑与辉煌。

——编者

一进太原市博物馆展区，最显眼的便是一块黑黢黢的大石头，有棱有角，有光滑处，也有脱落处，博物馆的标注为“石核”。考古人给石核做过“体检”，长52cm，宽24cm，厚14cm。石核也是有“出生地”的：古交凤凰岩。

古交在太原市西部，像一只鸟儿栖息在吕梁山中段的一片“树叶”上。吕梁山的基本骨架生成于李四光提出的“吕梁革命”，距今大约20~18亿年，6500万年前，燕山运动使吕梁山轮廓形成。“全新世时，山地继续上升，河流的切割作用继续加强，盆地不断下降，冲积扇不断前移，形成了多级扇，盆地中心，汾河左右摆动，随成今日之地形地貌。”（常一民《先秦太原研究》）当然，古交地形地貌也在其中。300万年前，汾河形成，从北向南蜿蜒时，路过古交，汇集了屯兰河、狮子河、大川河等几条支流，穿过太原，奔黄河去了。

山，河，注定人类的活动半径。

人们把农业文明起源之前、使用打制石器的史前人类遗存，称为旧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文化。太原地区哪一年有了人类，不能确指，但可以知道的是，距今约240~70万年前，晋中地区包括太原，还是一片古湖时，古交的一些台地上，就有了人类生存的痕迹。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从猿人过渡到直立人阶段，已经学会使用简单的石器做工具，能完成狩猎和采集活动。人类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气候里，与许多树木和动物为伴。他们已经学会使用火，有晋南西侯度遗址为证。

石核，是指古人类使用剥片工具在石料上剥片或打片产生石片后，遗留下来的内核部分，一般较大而瘦长，亦称石叶石核。也就是说，石核是一块大石料的“内心”。因是石质，确实也可称之为“硬核”。石核是用来打砸动物或植物的，也可用作武器。

这片石核发现于上世纪。

凤凰岩属于古交旧石器遗址的一部分。古交大遗址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发现，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凤凰岩遗址，考古人在这里做了几十年的调查和发掘，发现了包括石核在内的砍砸器、刮削器、尖状器、石锤等工具。石核就属于砍砸器。

古交的多处旧石器遗址，联结起一个太原地区远古时期古人类的生活图景。汾河边的台地上，人

类过着群居的生活，这时的气候是末次盛冰期来临前的温暖期，相对适宜人类生存。这里周围应该有森林，山前有草原，树木和青草铺满空地，汾河清澈，缓慢而平静地流淌，许多动物奔跑在森林和草原中，蓝天、白云、青草、鲜花，交织成人们的生态环境。人类一般是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，白天出去狩猎动物或采集植物的果实、叶、根、茎，或者去附近河滩里捡拾鱼类，晚上在山洞里栖息，两块燧石摩擦，生起火，驱散野兽和黑暗。他们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寿命很短，艰难地繁衍。

上世纪中国最先发现的旧石器遗址，是临汾丁村。为写作《大地上的遗珍》一书，我曾采访过把一生都献给了丁村的考古人陶富海，陶先生说过，华北旧石器地点，存在“工”字文化网络，上面一横是桑干河到河套地区的遗址，中间一竖是循汾河流域分布的从静乐到万荣的遗址，下面一横是从渭河到黄河分布的遗址。这也符合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“Y”字文化理论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陶先生的上面一横，相当于“周口店—峙峪”体系，石器较小，主要使用刮削器，下面一横相当于“匭河—丁村”体系，石器较大，多使用砍砸器，而这两种使用不同石器的人沿着汾河来来往往。虽然凤凰岩石器多延续南边丁村体系石器特征，但古交地区同时也发现了北边的小石器，充分证明，太原地区是古人类南下北上的通道，同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。

石头总是比人的肉体更长久的，使用这块石核的人早已灰飞烟灭，整个古交使用旧石器的人，也都化作尘世中的一粒尘埃，而石核，被古人类打制过的“硬核”工具，却顽强地带着远古人类的气息存在着，试图告诉后人一些东西。

古交，因汾河和孔河二水于此交汇而得名，境内峰峦叠嶂，沟壑纵横，一直到公元前541年大鹵之战中，晋国大败戎狄，此处归于晋国，面目才清晰起来。很多很多年前的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在这儿的演化，都像一场梦一样，起笔一挥就消逝于天地间，所幸还有考古人。

考古人用自己的岁月释读无字地书，他们把不会说话的石头搬进了博物馆里，他们和石头，慢慢地露出了最美的笑容。

万物

黄瓜清香

薛宏新

黄瓜本姓胡，它的名字是隋炀帝改的。唐代吴兢《贞观政要·慎所好》中记载：“隋炀帝性好猜防，专信邪道，大忌胡人，乃至谓胡床为交床，胡瓜为黄瓜……”因忌讳胡人，隋炀帝把带“胡”字的物件都换了叫法。

黄瓜的清香从诗文里飘散而来。诗人陆游在《秋怀》中写道：“园丁傍架摘黄瓜，村女沿篱采碧花。”金秋时节，园中农人靠着瓜架采摘黄瓜，村中妇女沿着篱笆采摘鲜花。诗中好一幅郊野村居图，充满生机，令人神往。

我每年都要在老家的院里院外种上几畦黄瓜。春天雨水充足，黄瓜苗栽下去没几天，秧就蹿起尺把高。秧子长到二尺来高时，就得搭架子了。用拇指粗细、两米长短的竹竿，搭成了一个长长的黄瓜架。架子搭好后，就等着黄瓜秧牵蔓、开花、结果了。隔个三五天不去菜园，再去瞧时，黄瓜藤已上下左右爬满了架。

入夏，垂挂在竹架上的黄瓜，摘下，用水冲冲，手再来回搓几下，生食，清脆鲜爽。虽有一点涩，汁水从黄瓜中喷涌而出，很快冲淡了涩味儿。

一根黄瓜，丰富了餐桌和生活。黄瓜可凉拌，切片后，浇上醋和麻油，放盐，拍几瓣蒜头，剁碎，撒到上面，吃起来倍爽。也有人把黄瓜拿来炒肉片，咋炒，都不能放酱油，酱油色重，黄瓜的本性就是青绿、清淡。

黄瓜除了食用，还有药用价值，其性味甘凉，入脾、胃、大肠，具除热、利水、解毒之功，可治疗烦渴、咽喉肿痛、火眼、火烫伤等症，亦有减肥瘦身、美容养颜之效，益处多多，可谓平民菜、贴心菜。

黄瓜，用清新气味调和了大众的生活，旺盛了人间烟火。

文物

瓷枕里的千年清凉

杨晓姝 文/图

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厅里，一件金代三彩虎枕静静陈列，它以卧虎为形，虎头伏于前腿之上，浓眉大眼间透着憨态，小鼻宽嘴微露门牙，口内特意开一气孔；虎尾贴于身侧，虎背作枕面，黑彩绘就的折枝花纹灵动雅致。虎身体通体以黄、黑二彩装饰，色彩明快又不失沉稳，将威猛与温顺巧妙融合。它不仅是金代制瓷技艺的缩影，更藏着古人与瓷枕相伴的千年往事。

瓷枕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。目前发现最早的瓷枕实物，是隋开皇十五年（595）河南安阳张盛夫妇合葬墓中的随葬品。到了唐代，瓷枕开始批量生产，变为寝具与诊脉工具。

宋金时期，瓷枕迎来黄金时代。形体变大的同时，装饰技法也突飞猛进。山西博物院的这件三彩虎枕便诞生于此时。卧虎造型在宋金瓷枕中颇为常见，古人认为虎能辟邪镇宅，将瓷枕塑造成虎形，既有实用价值，又寄托了平安吉祥的祈愿。

古人对瓷枕的青睐，首先源于它的实用属性。瓷枕枕面有釉，自带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，是天然的“避暑神器”。空心的瓷枕还被当作小型“保险柜”，兼顾实用与安全。

从人体工学角度看，瓷枕设计颇有讲究。瓷枕多做成贴合头部的凹陷曲面，能有效保持颈部自然曲



金代三彩虎枕（山西博物院藏）

度。瓷枕高度多在10厘米左右，这与现代医学推荐的成年人最佳枕高一致，可见古人的生活智慧。

除了实用，瓷枕更是承载文化的载体。宋金时期的瓷枕装饰极为丰富，山西博物院的金代三彩虎枕上的黑彩折枝花，便是当时流行的植物题材装饰。那时的瓷枕纹饰包罗万象：有展现生活温情的卧女枕、孩童枕；有再现历史片段的故事枕。这些图案不仅是工匠技艺的展现，更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习俗与审美追求。

瓷枕在明清时期逐渐式微。随着更优制枕材料的出现，瓷枕生产范围缩小，多沦为专为逝者辟邪的“寿枕”。

如今，当我们凝视山西博物院的这件三彩虎枕时，透过这方清凉枕具，我们能窥见古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情怀。